

精英社会学的批判传统： 复兴与迭代^{*}

吕 鹏 傅 凡

内容提要 不平等在欧美国家的持续扩大和由此引发的社会运动,促使关于精英的社会学研究,尤其是其中的批判传统,正在经历一场复兴。在越来越多元的数据和各种新方法的助力下,复兴后的精英社会学试图重新塑造研究的框架和对象,重点聚焦超级精英、少数群体精英等新研究对象,拓展了网络分析和阶级分析等新框架,也促进了研究者对定量、定性和混合研究方法在精英研究中如何可以更好运用的反思。同时,国外精英研究者的成就和不足为中国精英社会学的迭代更新带来了诸多重要启发。

关键词 精英社会学 社会不平等 超级精英 阶级分析 精英数据库

精英社会学的复兴:历史的回溯

最近十年以来,精英社会学(sociology of elite)^①开始了一场引人注目的“复兴”。在经历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萎靡”状态之后,大量的社会学研究将精英群体作为分析对象,并在主流期刊和公共领域引发了热烈的讨论。例如,仅2017年,欧美社会科学期刊上就出现了至少六期精英社会学专题研究。^②相关论文和专著在新背景下探讨了精英对社会分层、代际传承和行业发展等社会各个方面的影响。精英研究为何会“重新”回到主流社会学界的视野当中?这一次的复兴,究竟是对上一次精英社会学研究高潮的重复甚至回光返照,还是有着实质性的突破?复兴后的精英社会学研究对于我们理解这个剧烈变动的社会有何新的启示?国外精英社会学的再次兴起,对于中国的相关研究将带来什么样的启示和影响?

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要解释一下精英社会学研究的兴起背景和上一次衰败的原因。自帕累托将“精英”这

一概念纳入社会学分析框架后,围绕精英展开的研究便层出不穷,诞生了诸如莫斯卡和米歇尔斯这样的所谓“古典精英理论”的代表人物。但社会学的“精英研究传统”并不应该局限于追述那些明确使用“精英”概念的人;事实上,包括政治家/政客、资本家/企业家、知识领袖在内的诸多“精英”人物,不仅是包括马克思、韦伯、涂尔干在内的社会学奠基人物频繁讨论的对象,甚至构成了他们主要著作的核心。二战后,社会的中心自欧洲转移至美国,多元主义(pluralism)逐渐成为精英研究中的主流思想。多元主义者相信,美国社会是一个多种权力相互制衡的社会,并不存在单一精英。然而,米尔斯于1956年出版的《权力精英》明确批判了多元主义。米尔斯在书中指出,美国存在三大主导力量,即公司富豪、军事领袖和政治董事,三者相互配合,共同引领国家的发展方向。^③

以米尔斯的《权力精英》为标志和集结号,加上后续学者的贡献,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欧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精英社会学形成了一个“批判传统”:精英社会学的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生代’中国私营企业主的构成、态度与行动研究”(项目号:18ASH003)的阶段性成果。感谢范晓光、刘学、黄冬娅等师友的意见和批评,文责自负。

批判传统主要不是致力于解决精英个人或者公司的(管理)问题,而是要与社会整体命运的关注紧密结合,甚至致力于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④理解这一点很重要:精英社会学虽然研究的是“精英”,但批判传统下的精英研究所关注的问题意识,绝不仅仅限于精英这个独特的群体,而有助于人们理解他们这批“社会等级制的顶层”与其他阶层/群体、与权力结构、与时代变迁的关系。

当时间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传统的批判性精英社会学却开始走向衰败。不是说没有人研究精英;事实上,欧美主流社会学期刊和顶级出版社不时仍有相关的优秀著述出现。^⑤问题的关键在于,就英语世界的社会学研究而言,本国的精英不再是一个热门的研究议题,新近发展的各种社会学理论也忽视或弱化了精英群体的作用。

衰败的原因主要有二。第一个是学科发展的影响。美国社会学在20世纪70年代迎来了转型,有学者将此转型的影响喻为“钳形运动”(the pincer movement):两个钳子一个是实证主义社会科学的霸权,另一个是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兴起^⑥。“钳形运动”的结果体现在两个方面:在方法上,实证主义转向导致定量研究方法,尤其是问卷调查,成为社会分层研究的主要工具,而精英作为一个人数稀少的群体难以被问卷调查所覆盖。在理论上,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转向促使研究者更重视制度性的影响因素,忽视了对具体能动者的关注,一些人否认诸如精英这样的行动者本身在社会变迁中的重要作用。

第二个,也是更重要的原因,是整个欧美经济和社会形势的映射。美国自20世纪60年代起经历了一段经济高速发展期,在此阶段内,各个阶层的生活水平均得到了显著提高,甚至有学者开始争论工人阶级是否都已经变成被资产阶级化了。^⑦面对诸如“阶级死亡”“资本家消失”这样的强势话语,这个时候的精英研究——尤其是批判性精英研究——首先要捍卫的问题是诸如资本家阶级是否存在、精英是否消亡这样的话题。^⑧这一状况到了“冷战”结束之后更加明显。在“历史的终结”这样的乐观主义情绪弥散和新经济红利高歌猛进的氛围下,许多人暂时忽视了社会中的不平等现象,并降低了对精英群体的关注度。

从上述回顾可以看到,精英社会学的衰败虽有技术原因,但更主要的是时代变化的一个后果;而今日精英研究在社会学的复兴,同样是时代的反映。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是一个重要的触发点:那些“太大而不能倒闭”(too big to fall)的公司以及高管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公众对金融资本主义的愤怒声讨^⑨;人们发现,随着资本主义经济进一步发展,世界经济不平等程度自1980年后不断提高,而精英既是这一轮全球性不平等的原因,也是结

果。因此当美国民众于2011年发起“占领华尔街”运动,打出“我们是后99%”的旗号时,很快就形成了一场跨越媒体、公众和学术界的运动,甚至引发了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白宫在内的当权者的回应,并对欧美的政治生态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事实上,精英研究在社会学中的再次回归,正是更为广泛的对不平等的强烈关注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也是为什么研究不平等问题的学者成为这一波精英社会学研究复兴的主力的原因。当前欧美社会更加分裂,民粹主义、经济增长、福利分配无一不是最为热门的议题,社会学学者对精英的研究——尤其是批判性研究——的兴趣恐怕还会持续甚至高涨。

新对象与新发现

随着精英群体重回研究视野,精英社会学最先面临的挑战便是如何定义他们的研究对象,因为这不仅涉及学理上的分析对象是谁,而且直接关系到研究者的政策和政治诉求指向的是什么群体。为此,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出发对新精英的本质做出了判定,并探讨了精英的界限所在。此外,复兴后的精英社会学特别关注精英群体内部的分化与发展,尤其是超级精英和少数群体精英的出现。

(一)精英的界定

精英群体内部的不断分化和精英特征的改变促使学者尝试重新定义精英。可汗将精英定义为“一群过度掌握或控制资源的人”^⑩。斯科特则认为当前学界对精英概念存在“滥用”的嫌疑,他强调精英只能指代拥有一定权力的人。^⑪然而,学者们对在经验研究层面到底将哪一类群体界定为“精英”并未达成共识,而是形成了三个主要的流派来界定精英,即分别根据声誉、决策角色、(结构)位置。即便是最正式、争议最小的“位置法”,学者们也不能总是达成一致。此外,虽然大部分学者同意将收入或财产的分布百分比视为确定精英的标准,但这个百分比究竟应该是多少仍然存在分歧。很大程度上受到“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口号的影响,“前百分之一”(one percent)的概念被广泛采用以指代精英,即年收入或财产总量达到全国前百分之一的人群。^⑫然而,谢尔曼的研究显示许多富人会将自己描述为“中产阶级”以逃避道德的审问,因此她认为“前百分之五”才是合适的精英标准。^⑬里维拉则认为精英是指收入占全国前百分之二十的人。她强调将精英定义为“前百分之五”甚至是“前百分之一”不利于看清美国当前的极端不平等以及隐藏在不平等背后的力量。^⑭

然而,在这些分歧的背后,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一个共识。那就是这些学者——以及触动这些学者去研究精英

的公众——都认为,“精英”是一个单独的群体(或者说“靶子”),应该将“精英”与其他群体,尤其是中产阶级,甚至一般的富裕人群区别开来。这与我们之前所介绍的90年代中后期流行的观点有着很大的不同:在那个经济腾飞似乎大多数人都受益的时代,精英的面貌是越来越模糊的。换句话说,“精英”之所以突然变得那么“扎眼”,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人们突然发现过去十年以来,布迪厄所说的“区隔”不是在弥合,而是在固化。精英甚至成为制造不平等的“引擎”。

(二) 重塑阶级分析

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重塑阶级分析”会成为精英社会学研究者的一个号召。他们主要从两个角度出发运用阶级分析理论:寻找新的阶级划分方法,探究新阶级的形成过程。萨维奇是倡导对整个社会结构进行重新划分的代表性学者。他指出,英国现有的阶级分析研究大多停留在工业社会范式阶段,在进行阶级分析时过于聚焦“无产阶级的问题意识”,只关注工人阶级与有产阶级之间的差别和对立。他认为应该将财富精英与相对富裕的中产阶级做出区分。基于2014年英国劳动力调查(Labour Force Survey)数据,他分析得出英国中上层内部出现了巨大分化,其内部差距甚至超过了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差距,一个精英阶层正逐渐脱离出其他阶层。对于精英如何日益拉大与其他阶层的差异,应该成为阶层分析的新焦点。^⑮

社会流动方面的不少研究则指出,精英与其他群体之间的差异在固化,阶级起源与精英地位之间的强相关(精英再生产)已经属于“老生常谈”,新数据则可以让研究者们在对最富有人群的研究中印证这一点。^⑯与政治精英相比,商业精英的社会出身与地位获得之间的关系更加直接^⑰,其中遗产(税)、继承对于财富不平等的影响非常明显。^⑱

相比上述研究“精英”与其他群体之间关系的研究,关于精英内部分化的研究(尤其是量化研究)更加薄弱。一些出色的研究更加值得一提。比如,通过运用主成分分析的方法,一些学者就以可视化的方式将精英在权力场域中的不同位置展现了出来,并揭示了将精英们区隔开来的主要因素。^⑲在社会流动方面,有研究者发现上层阶级不同群体的社会闭合程度存在差异,而这种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文凭要求的程度,且父母的社会地位也会影响子女进入上层阶级的轨迹。^⑳正是这种“微观阶级”层面的固化(micro-class immobility),强化了上层阶级的再生产。^㉑

(三) 全球化与超级精英的崛起

富豪自古有之,但全球化加速了他们的成长和扩散。

阿特金森等人发现,自1980年起,英国、美国、中国和印度等国均出现了收入集中程度的持续增强。^㉒许多学者将占据极端经济优势地位的精英群体称为“超级富豪”(super-rich)。有研究发现,“超级富豪”的出现与1980年之后劳工联盟弱化、高收入税率降低以及全球贸易开放有关。^㉓超级精英群体的出现反映了各国社会的不平等现状,也为学者探究不平等的根源与发展提供了新的分析对象。

财富的全球大挪移、发展中国家的崛起、跨国精英的出现使研究者意识到超越单一国别的社会不平等正在加剧,而此现象必须借助全球性视野和跨国比较才能被理解,也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跨国资本家阶级”的认识与分析。例如,科森等人指出,一个全球性的超级资产阶级正在形成,其形成原因主要有四:财富的高度集中、各国间经济交流的提升、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趋同以及相关国际组织的推动。^㉔亨斯克科等人也证实了“跨国资本家阶级”的存在,并发现其全球性联系即使在经济危机期间仍十分稳健。^㉕但学者在该阶级是否存在超越国别的共同利益问题上产生了分歧。20世纪末期的研究大多认为“跨国资本家阶级”超越了国家间的利益斗争,形成了国际性的利益共识。^㉖但基于21世纪全球化背景的研究则质疑了上述共识。新的研究证实,“跨国资本家阶级”镶嵌于资本家所属国家的环境与利益之中,本国利益和国际利益一同构成了其利益共识。^㉗

(四) 少数群体精英的困境

复兴前的精英研究大多关注白人男性,对女性精英和少数族裔精英等人群的情况知之甚少。20世纪90年代初兴起的第三次女权运动使学界再次将女性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重点之一。精英社会学研究者逐渐意识到女性精英与男性精英在分布和特征上的差异,以及女性在成为精英途中所遇到的独特困境。同时,学者开始关注诸如非裔美国人等少数族裔精英的发展历程与特征。

关于女性精英的社会学研究证实,无论是在追求精英地位的过程中,还是在成为精英之后,女性都更容易遇到阻碍和歧视。尼利通过与对冲基金从业者的深度访谈得出结论,在此类高经济回报率的产业内,传统的世袭主义导致行业被白人男性所垄断,女性难以获得资源和上升途径。^㉘谢尔曼发现精英家庭中存在多种权力冲突,妻子往往承担更多的家务劳动,而男性精英常不承认妻子家务劳动的价值,甚至会用限制消费等手段来行使权力。^㉙

少数族裔人群在精英竞争中也处于相对劣势。茨韦根哈夫发现非裔美国学生在精英学校中面临着诸如种族歧视、能力质疑和同伴排斥等挑战。^㉚麦克林托克则利用

某精英大学的社交生活调查数据证实,非裔美国大学生在社交上处于相对孤立状态,其恋爱对象往往局限于非裔同学。^⑩目前针对少数族裔精英展开的研究仍存在两方面局限。首先,几乎所有研究都将目光聚焦于非裔美国人,且研究对象大多为学生,缺乏对其他族裔精英和非学生精英的调查分析。其次,大多数研究是在研究性别或阶层时“顺带”对种族问题进行分析,缺乏以种族为核心的深度研究。

(五)内部圈子的瓦解与续存

精英社会学的批判传统里有一个重要的研究主题,即对商业精英“内部圈子”的揭示。“内部圈子”理论(inner circle)的创始人尤西姆提出,在20世纪中后期的英美国家中,出现了一群特殊的商业精英,他们往往在多家公司任职,通过商业圆桌会议等渠道保持频繁沟通。尤西姆将由此类商业精英组成的集体称为内部圈子,并将他们与其余的普通商业精英做出区分。^⑪许多研究者沿着这一思路展开了对现代商业精英的分析,并根据精英群体的新变化对该理论做出了批判与拓展。

已经有中文文献对于国内外的连锁董事研究做了全面的梳理^⑫,我们在此做一点补充。米祖鲁奇在2013年结集出版的著作对尤西姆的“内部圈子”理论进行了全面反驳,他认为,长期存在的商业精英圈子目前正在瓦解,商业精英不再互相联结,也不再具有强大的社会和政治影响力。^⑬楚约翰等人通过对美国商业精英联结网络的实证分析佐证了米祖鲁奇的结论,并将美国商业精英圈子瓦解的原因总结为:大量的企业内部丑闻逼迫市场出台法规以限制股东的参企数量,同时美国政府和劳工联盟的衰弱使得企业不再有团结的需要。^⑭因而,那些“老男孩俱乐部”“内部圈子”之类的观点对了解金融资本的真实运作没有帮助,精英研究需要新的分析工具。

然而,部分学者并不认同“内部圈子”瓦解论,他们或立足于非英美国国家,或着眼于全球市场,对“内部圈子”的续存与发展进行了深入分析。拉森等人的研究发现,在典型的平等主义国家丹麦,国家与劳工联盟依然拥有较强的力量。因此,丹麦商业精英在21世纪仍然保持着较强的联结度。^⑮亚默里则通过对全球前500强企业的分析得出结论,无论在美国本土还是在全球范围内,21世纪的商业精英依然紧密相连。他认为是跨国性的资本利益驱动着新商业精英协同作战,因此单一政府或工人联盟的衰弱并不会导致“内部圈子”的瓦解。^⑯

除了商业精英在公司董事会的连锁之外,近些年来有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其他精英在非商业领域的连锁。与研究对象的拓展、方法和技术上的进步相比,更重要的是回归初心:精英们在多大程度上团结起来以及如

何连接,一直是精英研究的核心话题。网络分析不能停留在仅仅满足于描述一副更加复杂的网络图景,而是要成为回答这一疑问的有力武器,成为破解权力精英流派与多元主义流派之间对立的一个有力工具。^⑰

新数据与新方法

数据和方法一直是制约精英社会学发展的最为重要的客观原因。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新数据的开发,复兴后的精英社会学研究借助改良后的定量与定性研究方法,将精英群体再次纳入研究范畴。此外,目前精英社会学在研究方法上显示出融合的趋势,混合研究方法正帮助精英研究迈上新的台阶。

(一)新数据与定量研究方法的升级

定量研究方法过去之所以将精英社会学研究带入死胡同,主要是因为问卷调查无法获得足够的精英人群样本。在这种情况下,正如有学者批评的那样,大型全国性抽样调查里的精英样本其实不够精英^⑱,或者,只能将精英当做一个整体去分析而忽视了内部复杂的分化。^⑲近年来精英群体的扩张和抽样技术的提高使问卷调查得以覆盖精英群体,且社会学家也正努力通过其他非问卷方法收集数据。此外,新的定量分析工具和方法使学者得以提出新的研究问题,并总结出更为可靠的研究结论。

新的精英数据有三大来源:问卷调查、政府数据和新闻媒体。

第一,问卷调查在新背景下取得了许多新进展。传统的抽样调查在研究精英时饱受批评,一些学者试图另辟蹊径。一种做法是开展专门针对特定精英人群的问卷调查,比如佩吉等学者发起了一项针对1%最富有美国人的调查项目。这项调查与其他调查的一个最大不同,是他们调查了美国精英的社会和政治态度。^⑳另一种做法则是使用“大数据”。在英国,研究者使用通过BBC公司开展的英国阶层调查(Great British Class Survey)的数据研究精英,该调查内容不仅在于样本规模巨大(2011到2013年间至少32万人参与),以中产及以上阶层为主,而且包含之前较少涉及的精英群体社会和文化生活相关信息。^㉑

第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使用政府数据研究精英,因为政府数据可以最大程度地克服精英群体难以接触的挑战。凯莉莎和穆勒梳理了社会科学家如何利用地产税、人口普查以及各种金融调查数据来综合匹配,从而考察财富的不平等状况。^㉒其中,在美国,联邦储备局开展的消费者财务调查(Survey of Consumer Finances, SCF)和美国经济资产负债表(Balance Sheets for the US Economy, FOF)是研究者最常使用的数据库。再

比如,阿特金森创造性地利用收入税收数据分析全球收入集中程度的历史变化。更重要的是,他于2011年组织建立了世界高收入数据库(The World Top Incomes Database),该数据库于2015年拓展更名为世界不平等数据库(World Inequality Database),拓展后的新数据库涵盖全球两百余个国家,为精英社会学研究者进行全球范围内的历史和比较研究提供了难得的数据。基于该数据库所写就的《世界不平等报告》于2018年出版,该报告集中呈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十余个大国自20世纪以来的不平等变化趋势和原因。^④

此外,一些欧洲国家的政府数据,比如瑞典的各种登记数据,也可以被学者获取,这些数据收录了这个国家大多数人口的家庭关系、社会流动、财富和税收状况、家庭成员的教育程度/职业等大量信息,是真正的“大数据”。这也是为什么众多关于财富的多代传承、精英的社会流动的定量研究都是以北欧为研究对象的原因。^⑤这样的数据也为这些研究者采取诸如序列分析、(引入家庭成员的)固定效应分析等方法提供了基础。

第三,各类新闻媒体制作的财富排行榜和富豪名录也提供了重要信息。20世纪70~80年代,诸如《美国杰出人物录》(Who's Who in America)这样的企业家名录、黄页被广泛使用,其思路与如今被广泛使用的富豪榜数据库是一致的:对公开的数据进行搜集、整理和重新编码,形成自己的新数据。这种方法耗时耗力,但一旦完成,会在精英分析中形成独特的优势。比如有学者自己整理了一套美国出版行业的创始人的资料集,从而可以分析1741~1860年间的杂志出版行业创始人的位置变化。^⑥

当然,富豪榜数据本身也可以经过“浅加工”之后直接使用。诺伊迈尔在福布斯全球富豪榜的基础之上,通过简单计算得出富豪上榜数量的国别差异,并将经济自由状况、国家政治形态等变量加入分析模型,从而总结出何种国家更适合富豪的成长。^⑦塞勒尼与他的合作者搜集了俄罗斯、匈牙利和中国的富豪榜数据,讨论这些国家的超级富豪的不同特征。总而言之,媒体富豪榜的数据大多比较单薄,需要与其他来源的数据进行结合,从而实现对富豪的深入分析。^⑧

(二)反思与改进定性研究方法

正如科森所言,在精英社会学领域中,假如缺乏运用定性研究方法的描述性研究,相关理论的发展将会受到限制。^⑨过去十年里,精英社会学领域出现了不少出类拔萃的实证研究。何柔宛以她在华尔街任职的亲身经历和对一百多位高管的访谈,写就了《清算:华尔街的日常生活》。这本著作探讨了华尔街的“聪明文化”如何构建了自己全球金融主导地位的形象,进而影响到美国企业文

化;而正是在这种逐利的“聪明文化”笼罩下,华尔街加剧了金融危机和萧条、贫困和不平等。^⑩可汗在其著作中展现了时代变迁下精英学校学生的变化。他回到他的母校圣保罗中学进行了为期一年的田野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新式精英对各类事物都采取开放的心态,能够轻易地应对各类事件,但这种安逸背后是与阶级和财富紧密相连的不平等。^⑪针对经济精英,里维拉通过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调查了高薪企业雇佣员工时所采取的策略。研究发现,在此类高薪企业的面试过程中,面试官往往倾向于挑选具备“精英”特质的应聘者,而这种“精英”特质则与应聘者的社会经济地位紧密相连。^⑫针对政治精英,戴维斯(Aeron Davis)对超过350名英国重要领域的精英进行访谈,进而分析了英国管理者和领导者如何建构权力并从中获利。^⑬

除了实证研究,对于在研究精英时会遇到什么样的方法论和技术挑战,定性研究者们一直有一个反思的传统。多重研究方法一直被鼓励:(深度/结构化)访谈、口述史、参与观察、文献分析都是常见的手段。这些其实也都是常规的定性研究方法。但当研究者们试图采用定性研究方法研究“精英”的时候,仍然会遇到与其他研究群体不同的挑战,比如很难获取进入的渠道、如何处理自己的立场(尤其是地位悬殊时)。近十年来一直不断地有学者对这些议题进行反思,或根据自己的研究经历现身说法,出现了不少优秀的作品。比如,哈维在一篇非常实用的文章里总结了研究者在访谈精英时的策略,甚至包括是否该录音、如何提问这样的细节;有学者总结了精英研究中信任关系的建立在获取渠道中的重要性,以及如何保持自己的研究立场;面对好莱坞这样封闭的社群,有学者介绍了自己通过“交互式的民族志”的方式获取信息的心得,也就是参加好莱坞面对公众的活动来进行参与观察。^⑭这些文章虽然不是讨论研究的“结果”,但对于技术和方法论的反思,恰恰是精英研究的从业者们最需要补上的一课。中国内地的精英研究,几乎没有出现这样的反思性作品,也很少有研究者总结和介绍自己从事精英研究的“田野心得”,不得不说是—种缺憾。

(三)走向融合:混合研究方法

早在1976年,精英社会学的领军学者们就曾指出,没有一种方法可以一次性地解决所有的理论争辩。因此,多种方法的使用是非常重要的。定量和定性研究方法的改良是新精英社会学发展的起点而非终点,新的综合性研究方法已崭露头角,它们或将帮助精英社会学研究迈上新的台阶。其中最重要的趋势是混合研究方法,它超越了定量定性之争,通过取长补短实现对社会不平等的精准分析。

混合研究方法是一种同时采集并分析定量和定性数据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该方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定量和定性研究方法各自的缺陷,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从而更好地解决研究问题,尤其是那些无法通过单一研究方法解答的问题。^⑤混合研究方法在精英研究中的运用可以帮助研究者在关注精英经济状况的同时得以了解其生活细节和内心想法。沃德等人通过焦点小组讨论、半结构化家庭访谈和全国性随机抽样问卷,探究了英国管理精英的文化消费特征与模式。^⑥赫德加德则将内容分析法应用于巴西的精英杂志和文章,在定性描述文章内容的同时对文化关键词进行定量分析,最终发现巴西精英的文化品位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国家的影响。^⑦

中国精英社会学的当下与未来

至此,我们总结了近十年以来英语世界里精英社会学研究复兴后所呈现出的变化与发展。新的现实冲突与学科发展促使研究者关注新的研究对象,发展新的理论框架,运用新的研究方法。对照欧美的议题来看,中国在追赶国际同行方面还有很多功课要做。比如,社会差距的扩大和精英群体的崛起并不是西方国家独有的现象,中国在一定程度上也面临着类似情况。就超级富豪的数量来说,中国已经仅次于美国,但我们的研究很薄弱;当前我国绝大多数研究将精英视为单一整体,较少关注女性精英和少数民族精英的发展;我们对于精英网络的研究也很不够,迄今都没有出现关于全国性精英的网络分析;关于精英的国别比较研究,以及中国精英在海外,基本上没有形成一个类似比较社会学那样的制度化的领域。此外,研究者应该更加关注精英的文化特征、消费模式和政治社会态度等,而决策过程的研究也方兴未艾。精英内部的流动、精英与非精英之间的转化也应该引起更多的重视,此类研究有助于探究阶层鸿沟的形成原因和破解策略。最后,日益落地的人工智能将会对社会结构、社会治理、社会心态产生不可预见的深刻影响,精英与大众的关系都可能将被重写。中国的精英社会学研究并不缺乏议题,飞跃的空间很大。

中国的精英社会学要想实现这个飞跃,首先要开发出更多的优质数据——无论是量化的还是质性的。一方面,中国的调查数据已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为解决早年的一些研究遗憾提供了弹药。比如,早年关于经济不平等的文献几乎都是以家计收入为因变量,但这几年关于财富的研究增多了;越来越多的学术机构主持的抽样调查已经将房产和金融资产作为重要的指标(比如中国家庭追踪调查、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另一方面,当定量研究讨论到中国精英时,如果采用的是全国性抽样调查数据,

在数据的选择和使用上依然或多或少存在本文所说的样本代表性“不够精英”或无法深入做精英内部异质性分析的问题,这就要求研究者们另辟蹊径。比如,皮凯蒂、杨利与加百孙·楚克曼就通过整合国民账户数据、调查数据以及最新税收数据来研究中国在1978~2015年间收入财富的累积分布情况。^⑧

更重要的是,一些各具特色的数据库也不断出现。比如,利用政治精英的名单研究领导干部的职业生涯、利用上市公司数据库研究董事会的连锁已经是比较常见的做法。还有一些并未成为主流、但值得更多研究者参与的做法。比如,倪志伟主持的长江三角洲企业调查,涉及了企业家的社会关系网络的信息;有人以富豪榜为基础,重新建构了信息更加丰富的数据库研究中国超级富豪;有人利用基金会中心网的数据,研究了中国非政府组织里的连锁董事;有人与地方政府机构合作,研究省域内的商会发展状况。^⑨事实上,这种数据库还有很多,只不过大多数仍然处于研究团队开发的阶段。近些年来,一些研究团队开始公开他们自己编码的精英数据库(比如中山大学徐现祥团队和复旦大学陈硕团队各自发布的领导人数据库),这种做法将有力地推动包括精英社会学在内的中国本土精英研究的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在形成自己的关于精英的数据库上,有着独特的优势。第一个是组织优势。中国的党政机关每年都组织各种各样的调查,这些调查的绝大多数都不公开原始数据,但有心人可以通过各种政府报告、蓝皮书获取面上信息。一些全国性的调查数据近年来开始公开,比如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CPES),这套数据包含了大量企业主个人层面的信息,历时25年,尤其宝贵。^⑩随着数据发布和使用的日益规范,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政府数据可以为学术和政策咨询服务;学术界也应该尽力联合政府里的有识之士共同建立更多的制度化的平台和渠道。定性研究也是如此,学术界应该更充分地利用官方渠道开展调研。

第二个是大数据的优势。大数据对社会科学的冲击目前才刚刚开始,在精英社会学研究中的应用凤毛麟角。但由于独特的体制和社会状况,中国在大数据的生产方面有着欧美国家不具备的“优势”,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场景丰富,且在获取上受到更少的社会监督(比如隐私的问题)。目前利用政府大数据(比如司法文书)、企业数据(比如微博数据)的实证研究逐年增多,其中一部分实际上已经涉及精英的问题(比如反腐败、算法歧视、社会政治态度、社会动员等),只不过在理论脉络和问题意识上尚未与精英社会学的传统有力衔接。正如贺光烨指出的那样,数据本身只是一个信息的载体,分析其中潜在的问

题与数据的“大”小无关,而是与思维有关。^①当越来越多计算社会科学的专家关注精英问题,或者越来越多的精英研究的传人们掌握了计算社会科学的方法之后,相信未来会有一个爆发期。

研究者对数据的追求是无穷无尽的,对于精英研究来说,可能永远也无法获取完美的数据,一些信息可能注定会成为无法揭开的“黑箱”。比如,决策过程的可信数据极其难以搜集(或者陷入知情却不能公开言说的困境),但这个问题不解决,精英研究就永远缺乏“结构—结果”上的关键一环。再比如,财富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的累积与收入有着完全不同的逻辑和机制。但是,仍然有很多差异是无法测量的,比如当我们测量收入时,其实更多地测量的是收入中的工资(wage)和利润(profits),但第三种收入类型,也就是人们从一种封闭关系(比如垄断和国家监管)中获取的收入——索伦森所说的“租”(rent)——却很难测量。^②因此,同样是不平等的扩大,造成的机制到底是什么就很重要。这背后实际上是对不同类型政商关系的判断。当研究者无“米”可“炊”的时候,是该放弃选题,还是坚持换一种方式言说呢?

本文一直在强调实证研究的重要性。但实证研究不等于量化研究。精英研究如果过于数学化,会重蹈经济学的覆辙。比数据更重要的是“社会学的想象力”;换句话说,与“缺数据”相比,更严重的是“缺理论”。关于中国精英的社会学研究,学术脉络本来是多元的,比如受到“国别研究”、单位制研究、基层治理研究、经济社会学甚至情报学的影响。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很大一部分——尤其是定量研究——受到了“市场转型之争”的影响。它深刻地影响了关于中国精英的社会学研究,丰富了我们对于中国精英的理解,尤其是在不平等、地位获得、阶层型构、社会流动等方面。但我们对于精英的很多其他维度依然知之甚少。

我们的建议是,不要先想着去做“理论建构”,而应该先从最简单的、探索性的描述性研究做起。搞清楚基本的社会事实,是我们去反思西方的概念和理论、建立自己的理论的基础。中国的“精英”由什么样的人构成?他们的规模和实力如何?中国真实的权力结构是什么样子的?全球产业大转移、以互联网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经济如何改变了我们财富分配的方式和后果?……我们在一些基本的问题上仍然没有深入地讨论,更不要说达成共识。当然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缺乏数据,但比这个更重要的,是研究者们有没有去开发、分享和完善数据的担当和勇气。

在这个基础上,再来谈迭代创新,尤其是理论上的贡献。欧美的精英社会学研究虽然取得了突出的成果,但

也存在着诸多不足。比如,这些学者树立了一种批判传统,这是他们的学脉能够代代相传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有一些研究过于强调“批判(经济)资本”,而对所谓“社会资本”有着过于温情的想象,认为“社会”是抵制资本的万能药,殊不知精英们也可以通过各种手段操纵“社会”乃至媒体;另一些研究则似乎走上另一种极端,认为所有的精英都在通过一种神秘的方式统治一切,却不能为此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再比如,当前欧美精英社会学研究的“议题建构”不可避免地受到欧美经济与社会发展阶段的影响,反而是一些关于市场经济兴起早期阶段和转型阶段(比如美国的“镀金时代”)的历史研究更加能够在中国的情境下找到共鸣。^③

因此,坚持批判传统并不是说要遵守欧美的研究议程,也不要被欧美的政治口号“带节奏”(比如一些欧美左翼学者倡导的对富人征税70%)。事实上,与欧美相比,中国有着差异巨大的国情,发展恰当的本土理论以解释中国特有现象是必由之路。比如,分析中国的精英再生产或循环,除了去寻找那些微观层面的要素(文凭、职业准入),更不能忽视的是宏观背景,尤其是剧烈的时代变迁和制度变化的影响。而诸如许多人跌宕起伏的集体生命历程这样的要素则提醒我们要打破线性的社会流动观。再比如,虽然很多人都知道中国的国家精英与市场精英的关系并不能简单地套用欧美的框架,而是有着基本政治制度的本质差异,但却不能创造出超越“威权主义”范式的话语体系。解决这一问题最终需要对国家理论、市场理论、国家—市场关系理论做出创新。批判传统的要义在于,如果研究精英的学者们,不能够致力于回答与中国精英有关的真问题,我们对于中国精英群体的描绘和措辞不能够尽可能地符合社会事实,关于精英的研究不能够跳出精英去关注更为广泛的社会各阶层的福祉、权益和社会进步,那么精英研究就摆脱不了兴盛一时又泯然一时的命运。

①“精英社会学”是以精英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学,而不是精英们从事的社会学。虽然精英的范围广泛(比如认为在各类组织中占据领导位置的人都可以称为精英),但单独研究政治精英(比如总统、州长、议员)在今天大多数时候会被划归为“政治科学”而不是“社会学”的研究范畴。这其实是一种学科壁垒,我们并不赞成。事实上,欧美社会学里也有很多关于政治精英的出色研究;但限于篇幅,我们在本文里不再展开。出于同样的考虑,纯粹的对文化精英的研究,也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

②2017年欧美社会科学期刊上出现的精英社会学专题研究包括但不限于:《理论、文化与社会》(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的“金融化后的精英与权力”专题,《南亚多学科学术杂志》(South Asia Multidisciplinary Academic Journal)的“关于印

- 度经济精英的社会学”专题,《民族和种族研究》(*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的“移民子女中即将到来的新精英:跨国和跨领域比较”专题,《社会符号学》(*Social Semiotics*)的“精英话语:地位、特权和权力的修辞”专题,《教育与工作杂志》(*Journal of Education and Work*)的“知识、技能和性格:精英的社会化与‘训练’”专题,《当代社会》(*Sociétés contemporaines*)的“当上层阶级与右派相处”专题(参见 Cousin, B., Khan, S., Mears, A.,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pathways for research on elites”, *Socio-Economic Review*, 2018, 16(2), pp. 225 ~ 249)。事实上,从本文的参考文献就可看出,不光是2017年,在各个年份无论是以特辑还是单篇的方式,精英研究广泛地发表于欧美各顶级社会学期刊上,《美国社会学年度评论》也于2012年和2014年刊登了专文总结。
- ③参见米尔斯《权力精英》,王崑、许荣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 ④Aronowitz, S., *Taking It Big: C. Wright Mills and the Making of Political Intellectual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2; Mintz, B., Freitag, P., Hendricks, C., et al., “Problems of Proof in Elite Research”, *Social Problems*, 1976, 23(3), pp. 314 ~ 324.
- ⑤Eyal, G., Szelenyi, I., Townsley, E. R., *Making Capitalism Without Capitalists: Class Formation and Elite Struggles in Post-communist Central Europe*, London: Verso, 1998; Lu, P., “The End of Postcommunism? The Beginning of a Supercommunism? China’s New Perspective”, *Polish Sociological Review*, 2012, 179(3), pp. 349 ~ 367.
- ⑥③Savage, M., Williams, K., “Elites: Remembered in Capitalism and Forgotten by Social Sciences”, *Sociological Review*, 2010, 56(1), pp. 1 ~ 24.
- ⑦Goldthorpe, J. H., Lockwood, D., Bechhofer, F., et al., “The Affluent Worker and the Thesis of Embourgeoisement: Some Preliminary Research Findings”, *Sociology*, 1967, 1(1), pp. 11 ~ 31.
- ⑧Gorz, A., *Farewell to the Working Class*, London: Pluto, 1982; Clark, T. N., Lipset, S. M., “Are Social Classes Dying”,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1991, 6(4), pp. 397 ~ 410.
- ⑨杨典、欧阳璇宇:《金融资本主义的崛起及其影响——对资本主义新形态的社会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12期。
- ⑩Khan, S. R., “The Sociology of Elite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012, (38), pp. 361 ~ 377.
- ⑪Scott, J., “Modes of Power and the Re-conceptualization of Elites”, *The Sociological Review*, 2008, 56(1), pp. 25 ~ 43.
- ⑫Keister, L. A., “The One Percent”,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014, 40(1), pp. 347 ~ 367.
- ⑬②⑨Sherman, R., *Uneasy Street: The Anxieties of Afflue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
- ⑭⑤②Rivera, L. A., *Pedigree: How Elite Students Get Elite Job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5.
- ⑮Savage, M., “Introduction to Elites from the ‘Problematic of the Proletariat’ to a Class Analysis of ‘Wealth Elites’”, *Sociological Review*, 2015, 63, pp. 223 ~ 239; Savage, M., Devine, F., Cunningham, N., et al., “A New Model of Social Class? Findings from the BBC’s Great British Class Survey Experiment”, *Sociology*, 2013, 47(2), pp. 219 ~ 250.
- ⑯Hansen, M. N., “Self-made Wealth or Family Wealth? Changes in Intergenerational Wealth Mobility”, *Social Forces*, 2014, 93(2), pp. 457 ~ 481.
- ⑰Mastekaasa, A., “Social Origins and Recruitment to Norwegian Business and Public Sector Elites”,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04, 20(3), pp. 221 ~ 235.
- ⑱Benton, R. A., Keister, L. A., “The Lasting Effect of Intergenerational Wealth Transfers: Human Capital, Family Formation, and Wealth”, *Soc Sci Res*, 2017, 68, pp. 1 ~ 14.
- ⑲Flemmen, M., “The Structure of the Upper Class: A Social Space Approach”, *Sociology*, 2012, 46(6), pp. 1039 ~ 1058; Hjelldrekk, J., Roux, B. L., Korsnes, O., et al., “The Norwegian Field of Power Anno 2000”, *European Societies*, 2007, 9(2), pp. 245 ~ 273.
- ⑳Flemmen, M., Toft, M., Andersen, P., et al., “Forms of Capital and Modes of Closure in Upper Class Reproduction”, *Sociology*, 2017, 51(6), pp. 1277 ~ 1298; Toft, M., “Mobility Closure in the Upper Class: Assessing Time and Forms of Capital”,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2019, 70(1), pp. 109 ~ 137.
- ㉑Ruggera, L., Barone, C., “Social Closure, Micro-class Immobility and the Intergenerational Reproduction of the Upper Class: A Comparative Study”,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2017, 68(2), pp. 194 ~ 214.
- ㉒Atkinson, A. B., Piketty, T., Saez, E., “Top Incomes in the Long Run of Histor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11, 49(1), pp. 3 ~ 71.
- ㉓Volscho, T. W., Kelly, N. J., “The Rise of the Super-rich: Power Resources, Taxes, Financial Markets, and the Dynamics of the Top 1 Percent, 1949 to 2008”,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12, 77(5), pp. 679 ~ 699.
- ㉔④⑨Cousin, B., Khan, S., Mears, A.,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Pathways for Research on Elites”, *Socio-Economic Review*, 2018, 16(2), pp. 225 ~ 249.
- ㉕Heemskerck, E. M., Fennema, M., Carroll, W. K., “The Global Corporate Elite After the Financial Crisis: Evidence from the Transnational Network of Interlocking Directorates”, *Global Networks*, 2016, 16(1), pp. 68 ~ 88.
- ㉖Robinson, W. I., Harris, J., “Towards a Global Ruling Class? Globalization and the Transnational Capitalist Class”, *Science & Society*, 2000, pp. 11 ~ 54.
- ㉗⑦⑦Murray, J., “Interlock Globally, Act Domestically: Corporate Political Unity in the 21st Centur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017, 122(6), pp. 1617 ~ 1663.
- ㉘Tobias Neely, M., “Fit to be King: How Patrimonialism on Wall Street Leads to Inequality”, *Socio-Economic Review*, 2018, 16(2), pp. 365 ~ 385.

- ③② Zweigenhaft, R. L., Domhoff, G. W., *Blacks in the White Elite: Will the Progress Continue?*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3.
- ③③ McClintock, E. A., “When Does Race Matter? Race, Sex, and Dating at an Elite University”,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2010, 72(1), pp. 45 ~ 72.
- ③④ Useem, M., *The Inner Circle: Large Corporations and the Rise of Business Political Activity in the US and U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 ③⑤ 马磊:《连锁董事网:研究回顾与反思》,《社会学研究》2014 年第 1 期。
- ③⑥ Mizuchi, M. S., *The Fracturing of the American Corporate Elit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 ③⑦ Chu, J. S., Davis, G. F., “Who Killed the Inner Circle? The Decline of the American Corporate Interlock Network”,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016, 122(3), pp. 714 ~ 754.
- ③⑧ Larsen, A. G., Ellersgaard, C. H., “The Inner Circle Revisited: The Case of an Egalitarian Society”, *Socio - Economic Review*, 2018, 16(2), pp. 251 ~ 275.
- ③⑨ Scott, J., *Corporate Business and Capitalist Class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吕鹏:《“权力精英”五十年:缘起、争论及再出发——兼论“权力精英”的中国叙事》,《开放时代》2006 年第 3 期。
- ④① Toft, M., “Upper - class Trajectories: Capital - specific Pathways to Power”, *Socio - Economic Review*, 2018, 16(2), pp. 341 ~ 364.
- ④② Page, B. I., Bartels, L. M., Seawright, J., “Democracy and the Policy Preferences of Wealthy Americans”,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2013, 11(1), pp. 51 ~ 73.
- ④③ Savage, M., Devine, F., Cunningham, N., et al., “A New Model of Social Class? Findings from the BBC’s Great British Class Survey Experiment”, *Sociology*, 2013, 47(2), pp. 219 ~ 250.
- ④④ Keister, L. A., Moller, S., “Wealth Ineq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000, 26(26), pp. 63 ~ 81.
- ④⑤ Alvaredo, F., Chancel, L., Piketty, T., et al., *World Inequality Report 2018*, Princeton: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 ④⑥ Hällsten, M., Pfeffer, F. T., “Grand Advantage: Family Wealth and Grandchildren’s Educational Achievement in Swede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17, 82(2), pp. 328 ~ 360.
- ④⑦ Haveman, H. A., Habinek, J., Goodman, L. A., “How Entrepreneurship Evolves: The Founders of New Magazines in America, 1741 ~ 1860”,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2012, 57(4), pp. 585 ~ 624.
- ④⑧ Neumayer, E., “The Super - rich in Global Perspective: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the Forbes List of Billionaires”, *Applied economics letters*, 2004, 11(13), pp. 793 ~ 796.
- ④⑨ Mihályi, P., Szelenyi, I., *Rent - seekers, Profits, Wages and Inequality: The Top 20%*, Cham: Palgrave Macmillan, 2018.
- ⑤① Ho, K., *Liquidated: An Ethnography of Wall Street*,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9.
- ⑤② Khan, S. R., *Privilege: The Making of an Adolescent Elite at St. Paul’s School*,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 ⑤③ Davis, A., *Reckless Opportunists: Elites at the End of the Establishment*,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18.
- ⑤④ Harvey, W. S., “Strategies for Conducting Elite Interviews”, *Qualitative Research*, 2011, 11(4), pp. 431 ~ 441; Mikecz, R., “Interviewing Elites: Addressing Methodological Issues”, *Qualitative Inquiry*, 2012, 18(6), pp. 482 ~ 493; Ortner, S. B., “Access: Reflections on Studying Up in Hollywood”, *Ethnography*, 2010, 11(2), pp. 211 ~ 233.
- ⑤⑤ Creswell, J. W., Clark, V. L. P., *Designing and Conducting Mixed Methods Research*, California: Sage Publications, 2017.
- ⑤⑥ Warde, A., Bennett, T., Really, N., “A Culture in Common: The Cultural Consumption of the UK Managerial Elite”, *The Sociological Review*, 2008, 56(1), pp. 240 ~ 259.
- ⑤⑦ Hedegard, D., “Transnational Connections: The Meaning of Global Culture in the Tastes of Brazilian Elites”, *Poetics*, 2015, 53, pp. 52 ~ 64.
- ⑤⑧ Piketty, T., Yang, L., Zucman, G., “Capital Accumulation, Private Property, and Inequality in China, 1978 ~ 2015”,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9, pp. 1 ~ 76.
- ⑤⑨ Nee, V., Opper, S., *Capitalism from Below: Markets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Ma, J., Dedeo, S., “State Power and Elite Autonomy in a Networked Civil Society: The Board Interlocking of Chinese Non - profits”, *Social Networks*, 2018, 51, pp. 291 ~ 302; 黄冬娅、张华:《民营企业如何组织起来?——基于广东工商联系统商会组织的分析》,《社会学研究》2018 年第 4 期。
- ⑥① 陈光金等:《中国私营企业调查 25 周年:现状与展望》,《南开管理评论》2018 年第 6 期。
- ⑥② 贺光烨:《喧嚣之后的沉思——关于社会科学大数据研究的认识论与方法论的讨论》,《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2 期。
- ⑥③ Mihályi, P., Szelenyi, I., “The Role of Rents in the Transition from Socialist Redistributive Economies to Market Capitalism”, *Comparative Sociology*, 2017, (16), pp. 1 ~ 26.
- ⑥④ Accominotti, F., Khan, S. R., Storer, A., “How Cultural Capital Emerged in Gilded Age America: Musical Purification and Cross - class Inclusion at the New York Philharmonic”,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018, 123(6), pp. 1743 ~ 1783.

作者简介:吕鹏,1981 年生,社会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暨私营企业主群体研究中心研究员;傅凡,1997 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丁惠平]